

黄今言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

陈晓鸣 温乐平 主编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
Jiangx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（南昌）

黄今言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

陈晓鸣 温乐平 主编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
Jiangx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黄今言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 / 陈晓鸣, 温乐平主编.

—南昌: 江西人民出版社, 2017. 6

ISBN 978 - 7 - 210 - 09489 - 0

I. ①黄… II. ①陈… ②温… III. ①黄今言 - 纪念文集②中国历史 - 秦汉时代 - 文集 IV. ①K232.07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07688 号

黄今言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

陈晓鸣 温乐平 主编

责任编辑: 陈世象

封面设计: 同异文化传媒

出版: 江西人民出版社

发行: 各地新华书店

地址: 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

学术出版中心电话: 0791 - 86898330

发行部电话: 0791 - 86898815

邮编: 330006

网址: www.jxp-ph.com

E-mail: swwpublic@sina.com web@jxp-ph.com

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张: 45.5

字数: 890 千字

ISBN 978 - 7 - 210 - 09489 - 0

赣版权登字—01—2017—361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定价: 98 元

承印厂: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



黄今言先生简介

黄今言，祖籍江西石城，1937年生。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原所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，全国优秀教师。曾任学校学位委员会副主任、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六至第十届副会长、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、江西省农村社会研究会顾问等职。长期研究秦汉史，承担并完成国家级、省部级课题多项。出版《秦汉赋役制度研究》《秦汉军制史论》《秦汉商品经济研究》《秦汉史文存》等专著八部，在《历史研究》《中国史研究》《中国经济史研究》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80余篇。曾获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、二、三等奖和曾宪梓教育基金二等奖。

历史是活在我们心中的文化（代序）

岁月是生活的长链。人们常常感叹时间不给人情，翻转的时间如同“白驹过隙”，如同“闪电而去”，一晃几十年，“时间都去哪儿了”？当然，时间的匆忙，丝毫也不会磨灭人们生活的轨迹。人们会在不知不觉中留下自己经历的印痕，书写自己奋斗的华章。到今年年底，我们就要迎来我校著名历史学家黄今言教授八十华诞了。这是黄今言先生的喜事，更是史学界同仁的喜庆！

人们着实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，但是，却可以笃定地把握自己的人生道路。对于许多出生苦寒的人来说，都是因为自己的奋斗并抓住了改变人生行程的机遇，最终获得了成功。黄今言先生可谓其中一员，具有典范意义。

1937年11月，黄今言先生出生在江西省石城县一个普通的农家。可以说，黄先生生不逢时。20世纪30年代的农村，出生在一般农民家庭的人，其生活的艰辛程度，可想而知。黄先生曾经回忆说，正是靠着父母的坚强和勤劳，靠他旺盛的生命力，他才能在贫穷生计中顽强地活下来，并一步一步地成长起来。在新中国建立之初，他家的生活境况也还不太好。1954年夏，黄先生在石城初中毕业后，为了不给家里增添生活负担，就毅然报考了读书不要钱的宁都师范学校。在师范学习期间，黄先生十分珍惜这“读书不要钱”的幸福生活，严格要求自己，勤学不厌，因此，他一直是班上的好学生。1957年初夏，黄先生中师毕业了。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个重要关头。由于他三年的不懈付出，因而又赢得了幸运的青睐，他以“全优生”被直接保送（免试）到江西师范学院（前身为民国时期教育部直属的国立中正大学，首任校长为民国时期著名的大学校长胡先骕博士；1983年更名为江西师范大学）历史系本科就读。在大学读书期间，黄今言先生秉持了他在中师阶段养成的好学深思的学习习惯，以饱满的学习积极性形成了大学四年刚健有为的学习状态，受到了老师的喜爱，同学的羡慕。1961年7月，黄先生以优异的学业毕业，并留校任教。随后，师从我国著名历史学家

黄今言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

谷霁光教授(1907—1993)攻读“秦汉魏晋南北朝史”多年。1965年初,他被借调到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,复又回校任教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他和当时我国许多知识分子一样,受到冲击,被迫中断了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。在1968年11月全省兴起的“干部下放”潮中,黄先生与几名省直机关干部和25名南昌市铁路中学知青一道,被“下放”到泰和县农村,参加劳动锻炼。1969年3月,他被调到泰和县革委会政治部,负责了一段时间的宣传理论工作。1972年5月,黄先生接到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调令,得以重回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,度过了几年“半教半闲”的时光。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,黄今言先生迎来了他一生中最好的光景,能够全身心地投身到历史学教学、科研、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之中去,“功夫不负有心人”,终于取得了丰硕成果,并得到了组织和同事的肯定和好评,先后被评为讲师、副教授、教授。

人生的价值,在于奋斗,在于创造,在于奉献社会。唯有奋斗、创造和奉献,才能放大生命的意义,使生命的个体成为社会的生命,使生命的价值超越生命本身。黄今言先生几十年如一日,把自己的工作与历史学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,扬起了学术的风帆,担负了育人的使命,释放了人生的光焰。

黄先生经历了幼时饥寒清贫,青少年时代寒窗苦读,青年时期政治动荡,直到壮年才真正安定下来,稳坐“冷板凳”,潜心做学问。他经常感慨十年浩劫使他耽误了韶华,中断了他所心爱的历史学教学、科研事业。只有身逢改革开放科教兴国的好时代,黄先生才能攒足干劲,做他所喜爱的历史学教育工作。从七七级开始,黄先生一直坚持给本科生上课,受到历届学生喜欢;他担任硕士、博士研究生导师,先后指导硕士生、博士生三十余人,他们都顺利通过学位论文答辩,取得了学位。黄先生在担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、中国经济史研究所所长期间,他主讲过“中国古代史”“中国古代经济史”“中国古代兵制史”“秦汉史”“秦汉史专题研究”“秦汉商品经济研究”“秦汉文献与简牍概要”等7门课程。对于每门课,他都认真备课,用心讲解。他常说,三尺讲台小,学生前途大,要把学生的前途搁在讲台上,认真讲课,毫不含糊。无论是本科生,还是研究生,他都自编教材,体现自己教学改革的思考和特色,参编或主编了《中国古代史讲义》(上册)1981年版、《中国古代史专题讲座》(上、下册)1985年版等教材。黄先生不仅注重教学与科研结合;也注重与学生互动,经常与学生交流、讨论。在互动中,黄先生把学生的学习与生活结合起来,他既关心学生的学业进步,也关怀学生成长成材;他不只是学生的学业导师,更是学生的人生导师。他常说,他平生所爱,一是与学生在一起,爱听学生叫他“黄老师”,“老师称呼声声重,一言一行配师名”;二是爱读书、爱思考,有了心得就立马写下来琢磨,笔耕不辍。

黄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研究,尤其是秦汉史研究。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,他潜心钻研中国古代史前沿问题,尤其是秦汉史研究。黄先生先后承担并完成国

家课题2项,省部级课题5项,海外合作课题1项;出版了《秦汉赋役制度研究》(1988年)、《秦汉军制史论》(1993年)、《中国军事通史·东汉卷》(合著,1998年)、《秦汉江南经济述略》(主编,1999年)、《秦汉经济史论考》(2000年)、《秦汉商品经济研究》(2005年)、《秦汉史丛考》(2008年)、《秦汉史文存》(2016年)等8部史学著作;仅1997年以来,在《历史研究》《文史》《中华文史论丛》《中国史研究》《中国经济史研究》等重要的专业学术刊物发表了政治史、经济史、军事史、区域社会史研究等系列论文80余篇。著述总字数多达300余万字。黄先生在研究方法上,注重宏观把握与微观剖析结合;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结合;定性分析与数学计量结合;坚持实证原则,服务现实;所以,他的这些论著刊发后,都在史学界产生了积极反响,论文有转载,著作有书评,同行评议有肯定。譬如,关于他的著作的书评,多为同行专家所写;他的史学论文有很高的转载率,多在《新华文摘》《中国史研究动态》《历史学年鉴》和中国人民大学《报刊复印资料》、《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》以及有关学术网站上全文转载、摘要或观点简介。他的很多研究成果还走出了国门,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,譬如韩国的《庆北史学》和日本的《东洋史研究》《东方学》《骏台史学》等多家外文刊物也转载、介绍或引征过黄先生论著的观点和看法。总之,数十年来,黄先生的科研成果不仅在课堂上使学生受益;而且在国内外史学界受到重视,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研究。

黄先生在教学、科研上辛勤耕耘,硕果累累,受到了组织的肯定和同事的尊敬。他获得了很多标志着他取得成功的荣誉和称号,比如,他获得省部级教学改革成果和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、二等奖多项;1991年被江西省教委评为学科带头人;1992年获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;1993年被选为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;1995年获得全国优秀教师称号;1999年获得“曾宪梓教育基金”二等奖,并在北京参加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授奖盛会;2000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;2004年受聘学校教授一类岗,2006年评为国家二级教授。黄先生的主要业绩也被收入《江西省突出贡献专家传略》《中国经济学专家辞典》《中外名人录》等多部辞书,还有一些报刊、广播、电视也宣传、介绍过黄先生教书育人、钻研史学、服务社会、创新学术的事迹。黄先生在七十岁时办理了退休手续,但他人退心不退,还经常关心学校历史学类专业建设、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、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和修订,多次为本科生、研究生开讲座,把读书、思考和写作作为退休后的重要生活,常有新作发表于各家学术期刊。黄先生以实际行动为学生树立了“学习到老,思考到老,研究到老”、“勤奋学习,认真工作,健康生活”的人生榜样。

平庸者都是一样的平庸,成功者各有各的不同。我们赞美成功者,鼓励开拓者,激励奋斗者,宽容挫折者,是因为他们以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内容,以他们的人生精彩升华了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,并为后来者树立了进步的标杆。一个人一年干一件事算不了什么;一个人十年干一件事还算不容易;而当他数十年如一

黄今言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

日地坚持做好一件事,当然就很了不起了!足以让人肃然起敬,值得人们学习了。黄今言先生五十多年如一日,克服了许多人们难以想象的困难,兢兢业业地置身于历史学教育事业,孜孜不倦地潜心于历史学研究事业,殚精竭虑地投身于中国文化遗产创新事业,毫无保留地把他的智慧服务于社会进步事业,虽谓书生,而志在四海矣!

杨绛先生生前曾经回答人们对她的关切:是什么使她有如此巨大的力量能够克服人生道路上的艰辛苦难,从而矢志不渝,并形成了无怨无悔、向上之气的美好品质?杨绛先生回答说:“是信仰,是老百姓说的‘念想’。”^①这是杨绛先生对于坚守者的文化揭示,具有重要的人生意义。我们庆祝黄今言先生的八十华诞,研讨他的教育、学术思想,追问他走向成功的精神力量,欣赏他终生坚守的精神家园,领略他的精神品质,这远比盘点他在教学、科研领域收获的“战利品”要重要得多!因为这样,可以嘉惠后人,丰富史学精神。黄今言先生是一名称职的“人师”,是一名中国古代史专家,他将他生命的全部很早就融入史学事业,早已成为一名通透的“史学人”了。因此,找寻黄先生终生以历史教学、历史研究、文化遗产创新的终极力量,还是应该深入到他所从事的史学事业中去。是什么呢?我认为,一言以蔽之,就是:历史是活在我们心中的文化。黄今言先生无比热爱历史教学与研究,很早就立志要像他的导师谷霁光先生那样具有阳雀扒枝、燕子衔泥的精神,真正做到“穷原委委稽秦汉,求是崇真究古今”^②。黄今言先生要以无比顽强的精神、毅力和意志,弄清历史的来去原委、是非曲直。以非常之心,集数十年之功,成非常之事,这就是他的“念想”。所以,数十年来,黄先生对于前人所未涉足的秦汉时期的诸多历史真相,念兹在兹,毫无别移!黄今言先生对于史学事业的坚守,上升到了文化的境界和高度,就具有了坚不可摧的文化自信力。这,还是要回到黄先生所从事的秦汉史研究中找寻答案。西汉武帝时代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讲述他著述《史记》的心路历程时,既动情于心,不免流露心迹;又总结前人,揭示古今常理,说道:“夫《诗》《书》隐约者,欲遂其志之思也。昔西伯拘羑里,演《周易》;孔子厄陈、蔡,作《春秋》;屈原放逐,著《离骚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;孙子膑脚,而论兵法;不韦迁蜀,世传《吕览》;韩非囚秦,《说难》《孤愤》;《诗》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”^③黄今言先生自幼读史,稔熟秦汉典籍,加之史学大家谷霁光教授指导引导,这样就能在黄先生心中激活文化理想,穷究古史谱新篇。

能够毕生献身于一桩事业的人,都是有信仰的人,有信念的人,有品格的人,有坚守的人。真可谓:“撼泰山易,撼信念难!”黄今言先生正是这样的人。

“黄今言先生八十华诞学术座谈会”召集人计划在会前出版一本由黄今言教授的友人、同行和门生所写的论文集,关于书名征求我的意见,同时他们提出,一定请我为

① 周毅:《纯真的生命,我见过了——记杨绛先生与文汇报笔会的这十年》,《文汇报》,2016年6月16日。

② 周声柱:《斯人已逝,流风可仰——忆著名历史学家谷霁光先生》,《南昌大学报》,2014年11月12日。

③ 司马迁:《史记卷一三零·太史公自序第七十》,中华书局,1999年。

本书写一篇“序言”之类的东西,实在是盛情难却!“盛情难却”一词,现在一般成了人际交往的冠冕堂皇,或搪塞敷衍之词,但它对于我确是认真之词。我之所以如此爽快地答应了,一是出于对黄先生由衷的仰慕之情;二是出于对于学校历史学专业的无限热爱之意;三是出于对许许多多默默耕耘在历史学教学、科研这片深情土地的同行的同情共感,所谓“嚶其鸣矣,求其友声”^①吧。

是为序。

原刊于《光明日报》2016年11月26日“理论·史学”版

张艳国

2016年9月10日

^① 《诗经·小雅·伐木》,中华书局,2009年。

目 录

历史是活在我们心中的文化(代序)

张艳国

- 1 昌邑王废帝海昏侯刘贺经历考辨 朱绍侯
- 9 秦汉新道家与黄老之学 熊铁基
- 12 论“徙民实边”不是屯田 刘光华
- 22 “亚细亚生产方式”再探讨
——重读《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》的思考 李根蟠
- 45 陈垣与鼠疫斗士伍连德
——以1911年扑灭东北鼠疫和“奉天国际鼠疫会议”为中心 张荣芳
- 69 汉初郡县长吏考 廖伯源
- 98 论东汉门阀的形成 周天游
- 123 论东魏北齐王爵的封授及元氏诸王的“准例降爵” 张鹤泉
- 139 安危在出令 存亡在所任
——秦汉“治安”三策(乙格式) 龚留柱
- 152 渠县东汉冯氏墓域石刻文字的史料价值 吕宗力
- 163 河西“之蜀”草原通道:丝路别支考 王子今
- 178 关于汉代循吏问题的再研究 刘 敏
- 196 汉代儒学的经学化进程 李振宏
- 235 汉代居延地区的信息传递与通行凭证 周国林
- 245 地富阶层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及历史怪圈
——毛泽东《寻乌调查》解读的启示 温 锐 陈 涛
- 262 《史》《汉》所记刘邦在汉中开汉业史事比较
——以《高祖本纪》和《高帝纪》为中心的考察 王文涛

- 273 从新朝到东汉:伦理政治演进的历史考察 王 健
- 283 从西汉抑商政策看官僚地主的经商 晋 文
- 293 汉初货币制度变革与经济结构的变动
——兼谈张家山汉简《钱律》问题 臧知非
- 310 秦汉帝陵及其影响 徐卫民
- 322 秦汉时期徭戍制度研究述评 王彦辉
- 331 秦汉“乡举里选”考辨 卜宪群
- 345 中国孙子学的整体辨析 赵国华
- 358 历史大视野下的霍光及刘贺被废事件
——兼论君主专制制度中的虚君治理 万义广
- 375 地缘战略与吴魏辽东之争 陈金凤
- 384 博弈与平衡:秦汉乡里社会中的民间秩序与国家权力 沈 刚
- 397 秦汉间的政治转折与相权问题探微 王 刚
- 416 地方县志的族谱化:以明清瑞金县志为考察中心 李晓方
- 431 试论西汉求贤诏 叶秋菊
- 442 试论鄱阳湖传统渔业饮食习俗与地方社会建构
——以鄱阳县古渔村管驿前为例 程宇昌
- 453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对传染病疫区的社会治理
——以余江县血防为中心 万 心 万振凡
- 465 西夏文《六韬》译本的文献学价值 邵 鸿 张海涛
- 472 儒家素质教育观的历史反思
——兼论大学素质教育中儒家素质教育观的继承、转化和发展 赵 明
- 487 秦汉工商管理思想析论 刘承祿
- 493 汉代江南城市与商业问题述论 陈晓鸣
- 505 汉代的出版业 陈昌文
- 510 水与汉代南方社会 王福昌
- 518 论汉代的财政危机及其对策 周 珮
- 525 论战国土地私有制 李恒全 宋澄宇
- 543 王阳明行《南赣乡约》时间辨析 黄志繁
- 546 汉代农业经济管理法初探 黄顺春
- 553 岳麓秦简所见“徭”制问题分析
——兼论“奴徭”和“吏徭” 朱德贵
- 583 “江东神”论考
——基于地方文献的分析 邹春生

593	秦汉时期通讯设施建设与军事信息传递问题论略	上官绪智
627	从张家山汉简看西汉初期徭役制度	温乐平
639	秦汉私营工商业多层次考察	谢 华
645	秦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新审视 ——以出土政务文书为中心	吴方基
663	再论《额简》“専部士吏典趣辄” ——兼谈汉代的士吏	吴方浪
680	我所敬仰的黄今言先生	张艳国
688	今言吾师:永远感怀的师生情谊	吴 琦
691	认真 严谨 执着 ——黄今言先生印象记	陈晓鸣
694	黄今言先生的《秦汉军制史论》读后	李祖德
698	说《秦汉军制史论》的创获	霍印章
700	古代商品经济断代研究的力作 ——黄今言先生的《秦汉商品经济研究》	徐卫民 方 原
704	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互动 ——黄今言教授《秦汉商品经济研究》评介	臧知非
709	一部研究古代江南经济的拓荒之作 ——读《秦汉江南经济述略》	陈世象
712	读黄今言先生的《秦汉商品经济研究》	王 亮
717	后 记	

昌邑王废帝海昏侯刘贺经历考辨

朱绍侯

一、海昏侯刘贺身世简介

最近江西南昌发掘了西汉海昏侯墓,出土文物之多、品位之高为近年所罕见。其陪葬品之奢华,非一般汉代列侯所能企及,这与刘贺的特殊身份有关,有必要略作介绍。

海昏侯刘贺,是汉武帝刘彻之孙,昌邑哀王刘髡之子。刘髡是武帝宠姬李夫人所生,因此他幼年时就深受武帝所宠爱,特聘儒学大师夏侯始昌为其少子刘髡施教。估计在立刘髡为昌邑王时,封赏也会特别优厚。但刘髡是汉武帝六个儿子中最平庸的一位。他既没有政治野心,又没有什么政绩,所以在《汉书·昌邑王髡传》中只有九个字的记载:“天汉四年(前9年)立,十一年薨。”刘髡死后,其子刘贺继立为昌邑王。他“在国素放纵,动作无节,武帝之丧,贺游猎不止”^①。这在当时是违背礼仪的重罪,因无人举报,他就敢任意胡为。昌邑国中尉王吉劝诫刘贺要停止游猎,注意读书,“考仁圣之风,习治国之道”,让他注意养生,使“体有乔、松之寿”,还暗示他与当今皇帝(昭帝)最亲,可能有继承帝位之机会。刘贺表面说:“中尉甚忠,数辅吾过。”并给予很重的物质奖励,但仍放纵不改^②。昌邑国郎中令龚遂对刘贺“久与驺奴、宰人游戏饮食,赏赐无度”,当面涕泣向刘贺劝诫说:“今大王亲近群小,渐渍邪恶,所习,存亡之机,不可不慎也。”并为他聘请“通经有行义者”,陪他一起学习,“以便坐则诵《诗》《书》,立则习礼容”,刘贺表面上接受了,没过几天就把陪他的人都赶走了^③。

① [宋]司马光:《资治通鉴》卷24《汉纪·昭帝纪》,中华书局,1992年,第776—777页。

② 《汉收》卷72《王吉传》。

③ 《汉书》卷89《龚遂传》。

黄今言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

在刘贺继承王位后的第十三年,即元平元年(前74年)四月,昭帝驾崩,无子,大将军霍光与群臣商议,要找一位与帝室最亲近的人立为皇帝。当时昭帝的亲弟兄中只有广陵王刘胥还在世,但因他行为不道不为昭帝所用而被排除,另一位亲人就是昭帝亲侄、昌邑王刘贺可以当选。于是霍光就奏明皇后,请下诏遣行(代理)大鸿胪事少府乐成等迎接昌邑王进京主持昭帝丧事,实际是要立刘贺为帝。

刘贺接到征书后,于当天中午即出发,黄昏时至定陶,半天走了135里,累死的马匹相望于道,其急切的心情于此可见。王吉上书劝诫刘贺说:“大王以丧事征,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,慎毋有所发。”即劝诫他不要过急。书中还说霍光辅政,有仁爱、勇智、忠信之德,为武帝所信任,故把天下托付给他,希望刘贺对霍光“事之、敬之,政事一听之,大王垂拱南面而已”^①。刘贺对王吉的忠告全当耳旁风。刘贺在路上不断扰民生事,到济阳(今河南兰考)时,求长鸣鸡、买积竹杖,过弘农(今河南灵宝)时,又令大奴善以衣车载女子供其淫乐。朝廷的使者责问昌邑国相安乐有无此事,刘贺谎称无,遂以处置大奴善了事,以洗清刘贺的丑闻。刘贺至霸上(今陕西西安东),大鸿胪至郊迎接,驸马请他乘舆车。刘贺命昌邑王太仆寿成赶车,郎中令龚遂参乘。至长安东郭门(东都门),龚遂说:“礼,奔丧望见国都哭,此长安东郭门也。”刘贺说我喉咙痛,不能哭。至长安城门,龚遂说:“大王宜下车,乡(向)阙西面伏哭,尽哀止。”这次刘贺答应了,“哭如仪”。元平元年(前74年)六月,刘贺接受皇帝玺绶,即皇帝位。即皇帝位后的刘贺仍然淫戏无度,日与近臣饮酒作乐,斗虎豹,或召皇帝专用的皮轩车,与亲信各处游荡,违背圣道。龚遂知道后,哭泣着对昌邑国相安乐说:“君,陛下故相,宜极谏诤。”^②而刘贺对所有谏诤一概不听。

刘贺即位后,把原昌邑国的官属二百余人调至长安,越级提拔以掌握中央实权。太仆张敞上书谏阻说:“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,天下莫不拭目倾耳,观化听风。(原来的)国辅大臣未褒(奖)而昌邑小辈先迁,此过之大者也。”^③刘贺仍然不听。

当时主政的霍光对新帝如此胡作非为深感忧虑,就问最亲近故吏大司农田延年应该怎么办。田延年说:“将军为国柱石,审此人不可,何不建白太后,更选贤而立之。”^④于是霍光暗中与大将军张安世商量废黜刘贺的计划,然后又与田延年找丞相杨敞说明情况。杨敞初时惊惧,不知所言,后经其夫人开导,才表示“请奉大将军教令”^⑤。在征得丞相杨敞同意后,霍光召集群臣在未央宫开会。霍光说:“昌邑王行昏乱,恐危社稷,如何?”群臣听后“皆惊愕失色,莫敢发言”。田延年遂离席按剑说:先帝(武帝)托孤以安天下,知将军忠贤,现在刘贺昏乱,社稷将倾,今日之议,必须迅速

① 《汉书》卷72《王吉传》,商务印书馆,1958年,第875页。

② [宋]司马光:《资治通鉴》卷24《汉纪·昭帝纪》,第780—781页。

③ 《汉书》卷76《张敞传》,第929页。

④ 王先谦:《汉书补注》,中华书局,1983年,第831页。

⑤ 《汉书》卷66《杨敞传》,第815页。

决定,群臣如有后应者,我将以剑斩之。于是群臣皆叩头曰:“万姓之命,在于将军。唯大将军令(听之)。”^①会议之后,霍光即率领群臣向皇太后奏陈昌邑王不可以承受宗庙的情况。太后遂下诏不许昌邑群臣进入宫门。刘贺入朝太后,想回未央宫温室,宦官闭门不许进。刘贺问为什么不让我进温室?霍光跪曰:皇太后有诏不让进。车骑将军张安世派羽林军逮捕了昌邑群臣二百余人,皆送入廷尉监狱。霍光又命令中常侍要看守好刘贺,不要让他自杀,以免落下杀主之名。

不久,太后有诏召刘贺,刘贺很恐惧地说:我有什么罪要召见我?太后身穿珠襦(宫服)端坐在帐中,侍御数百人皆持兵器。群臣以次上殿,昌邑王伏前听诏。霍光、杨敞等大臣联名陈奏昌邑王受诏入朝后的劣迹。如:居丧时无悲哀之心,废礼仪;在进京路上不素食,掠取女子;立为太子后,私买鸡豚以食;受皇帝玺后,在昭帝灵前发玺不封;在宫中召引从官、官奴二百余人敖戏;赐昌邑国侍中君卿取十妻;昭帝之棺在前殿时,击鼓、歌吹、作俳倡;乘法驾驰驱北宫,弄彘斗虎;召皇太后所乘小马车让官奴骑乘;与昭帝宫人淫乱;取诸侯、列侯、二千石印绶给昌邑国郎官、免奴为良人者佩带,发御府金钱、刀剑、玉器、采缯赏与游戏者;令使者持节以三大牢(最隆重的祭礼)祭祀昌邑王,自称“嗣子皇帝”。由此揭露了昌邑王即皇帝位前后荒淫迷惑、失帝王礼仪、乱汉家制度等及“受玺以来二十七日,使者旁午频繁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”^②。最后杨敞奏曰:臣敞等谨与众博士议,皆曰:“今陛下嗣孝昭帝后,行淫辟不轨,五辟(刑)之属,莫大不孝者……宗庙重于君,陛下未见命高庙,不可以乘天序,奉祖宗庙,子万姓,当废。”^③杨敞所奏刘贺的劣迹中,每一件都构成杀身之罪,其中所说的“宗庙重于君,陛下未见命高庙”分量颇重,意思是说,刘贺没有祭祀高祖庙,没有得到高祖的认可,就不能成为皇帝,应当废黜。皇太后同意大臣的陈奏,刘贺就被废黜了。按群臣的意见,刘贺被废黜后应当流放到汉中房陵县,太后不同意,命刘贺回昌邑,免去王爵,但原昌邑国的财产仍归刘贺所有,另赐食邑二千户,既没封新爵,也没说免为庶人,故昌邑人称他为“故王”。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处分方案。刘贺凭昌邑王国财产和二千户食邑,仍有条件过他的奢侈、腐化、荒淫无度的生活。宣帝即位后,对刘贺颇有顾忌,怕他有复辟意图,故暗中给山阳太守下诏让他对刘贺监督、查防。张敞受命后,就开始督察刘贺的行为踪迹,并向宣帝秘密汇报。大的汇报有两次。第一次是在地节三年(前67年)五月,说他亲自视察“故昌邑王居,故宫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,闭大门开小门。廉吏(督察吏)一人,为领钱物,市买朝内食物,它不得出入。督盗一人,别主徼循往来者”。意思是说他视察时,发现刘贺行为谨慎,对外没有交往,也没有闲杂人员出入。第二次大的汇报是在地节四年九月,张敞又亲自视察刘贺

① 《汉书》卷68《霍光传》,第832页。

② 征发,指向各地索要贡品。

③ 《汉书》卷68《霍光传》,第831—834页。

——
黄今言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

住处,“状故往年二十六七,为人青黑色,小目鼻未锐卑(尖鼻),少须眉,身体长大,疾痿,步行不便,衣短大裤……察故王衣服,起居、跪起、清狂不惠(白痴)……终不见仁义”^①。中间还多次打过小报告。宣帝看过汇报后,知道昌邑王刘贺并无复辟野心,只痴迷于腐朽生活,而且未老先衰,体弱多病,遂不以为念,就放心了,于元康三年(前63年),封故昌邑王刘贺为海昏侯,食邑四千户;后侦知他背地说霍光坏话而削户三千。至神爵三年(前59年),海昏侯刘贺病逝。因其身前行为淫辟,“不得置后”^②。至初元三年(前46年),元帝才封刘贺子代宗为海昏侯,代宗死后其子保世嗣位,保世死后其子会邑继立,直到东汉建武年间仍有海昏侯国存在。

以上史实说明,刘贺的一生是非常坎坷的。他经历了昌邑王、废帝、海昏侯三个身份;但他又是很幸运的,他虽失去帝位,却仍拥有昌邑国财富及侯爵。他死后殉葬品之所以丰富多彩,与他拥有昌邑国财富有关,是一般列侯无法企及的。当然也反映了汉代“昭宣中兴”、社会进步、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况。

二、昌邑王国地望考辨

关于汉代昌邑国的地望究竟在什么地方,历史文献中很早就有争议,有的说在山阳郡,有的说在豫章郡。那么豫章郡说是怎么来的呢?其根据介绍如下。

臧励稣等编辑的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》对昌邑有两个词条。其一是“昌邑城”,在该词条下说:“在江西永修县北六十里。汉废昌邑王为海昏侯,此其处。刘昭《后汉书注》海昏县有昌邑城。《豫章记》:城东十三里江边名慨口,昌邑王每乘海东望,至此辄愤慨而还,故谓之慨口。今名游塘城。”其二是“昌邑县”,在该条目下说:“秦置。汉昌邑王国。山阳郡。后汉兖州刺史皆治此。南朝宋废。隋复置。寻省。故城在今山东金乡县西北四十里。”^③这便提出了两个昌邑的问题。特别是“昌邑城”条中“汉废昌邑王为海昏侯,此其处”一语,虽较模糊,但再配以“昌邑王每乘海东望”云云,昌邑王国址在江西(汉豫章郡)的结论就几乎坐实了。而关于山阳郡的“昌邑县”,则只是简单说了“汉昌邑王国”几个字,远不及“昌邑城”条写得具体生动。而豫章郡有昌邑城,并且在此即废帝昌邑王刘贺的昌邑国也是有据可寻的。关于把昌邑王国误谓在豫章郡,首先是王先谦的《汉书补注》。他在《汉书·地理志》“豫章郡海昏”条目注:“先谦曰:《续志》后汉李注有昌邑城。赣水注,潦水导源建昌县(今南昌市新建区),汉元帝永光二年分海昏立,又东经新吴县,又经海昏县,为上潦水,又为海昏江,分为二水。县东津上有亭,为济渡之要。其水东北迳昌邑城,而东出豫章大江,谓之

① 《汉书》卷63《昌邑哀王髡传》,第775—776页。

② 王先谦:《汉书补注》,第204页。

③ 臧励稣: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》,香港商务印书馆分馆,1931年,第472页。

慨口。昔汉昌邑王之封海昏也。每乘流东望，辄愤慨而还，世因名焉。”

王先谦的说法，又来自《续汉志》李贤注和《水经注》。

《后汉书·郡国四》：豫章郡……“海昏”侯国。李贤注曰：在昌邑城。《豫章记》（南朝宋人雷次宗撰）曰：“城东十三里，县列江边，名慨口，出豫章大江之口也。昌邑王每乘流东望，辄愤慨而还，故谓之慨口。”

《水经注》“赣水”条：“潦水又迳海昏县，王莽更名宜生，谓之上潦水，又谓之海昏江，分为二水。县东津上有亭，为济渡之要。其水东北迳昌邑城，而东出豫章大江，谓之考口。昔汉昌邑王之封海昏也。每乘流东望，辄愤慨而还，世因名焉。”

这里牵涉了南朝宋人雷次宗、北魏人酈道元和唐代人李贤。从简单的年代先后看，雷次宗、酈道元、李贤三人相因并转相发挥而成。雷次宗讲了“昌邑王每乘流东望”；酈道元添加了一个“昌邑城”；李贤注进一步断言“海昏侯国在昌邑城”。于是，这个故事就讲圆了。起因于雷次宗，酈道元发挥了一下，李贤注作了定论。而这一切都是起因于一个非事实性的习惯性说法、一个不靠谱的说法：“昌邑王每乘流东望。”本应是说“海昏侯每乘流东望”（如果不是海昏侯乘流东望而是昌邑王的话，那还是刘贺的得意之时，享受着王的尊严和待遇，他愤慨什么呢？海昏侯因地位被废，才有愤慨之气），但人们习惯用昌邑王来称呼海昏侯，于是产生了这个说法。酈道元进而又添加一个“昌邑城”。当然，酈道元也不是凭空想象，其根据也可能是《豫章记》。据谢曼《（康熙）江西通志》卷三十八记载：“《豫章记》昌邑王贺既废之，后宣帝封为海昏侯，东就国，筑城于此。”很可能是刘贺从昌邑迁为海昏侯，在此新筑城邑，时人或后人称为“昌邑城”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酈道元在记载此处的“昌邑城”时多说一句话给予交代，也就不会有后世的误会了。既然汉代就有昌邑城，昌邑王后来又改封为海昏侯，自然会使人联想到海昏侯是在昌邑原址获封，李贤就这么顺势而说。至近代，人们编写地名词典的时候就直接明了地说：“汉废昌邑王为海昏侯，此其处。”一个历史的误会就这样形成了。

真实的汉史文献中，豫章郡根本就没有什么“昌邑县”或“昌邑城”。

根据《汉书》有关记载，昌邑王国在山阳郡，海昏侯国在豫章郡，是极其清楚的。如：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：山阳郡……昌邑，武帝天汉四年更山阳为昌邑国。《后汉书·郡国三》：山阳郡……“昌邑”，刺史治。《汉书·王子侯表》：“海昏侯贺”，国址“豫章”。

综合《汉书》关于昌邑王或海昏侯的记载，可以得出三项铁证，证明昌邑王国确实山阳郡而不是在豫章郡。

其一，山阳郡与昌邑国的更替废立，把此事说得甚明。《汉书》地理志：“山阳郡……昌邑，武帝天汉四年更山阳为昌邑国。”《汉书·昌邑哀王髡传》：“废贺归故国，赐汤沐邑二千户，故王家财物皆与贺。及哀王女四人各赐汤沐邑千户……国除，